



伟大的抗战

经济：持久抗战的物质保证

罗平汉 齐小林

70多年前,在艰苦卓绝、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中,较量的不仅是二者的军事实力,而且是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其时,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而落后的农业国,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却先进的工业国。不论是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大后方,还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政策,为坚持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大后方的经济与正面战场的抗战

法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工业内迁支撑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田赋征实缓解了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把抗战进行到底提供了物质保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昭然若揭,国民党政府为应对日本的侵略也着手进行各种准备。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废两用元,一切交易不再用银两,改用银元,中国货币开始走向统一。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法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为抗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法币得到广泛流通后,国民党政府可以最大限度集中白银等重金属,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急需的各种战略物资。鉴于中国工业之精华多在沿海,随着对西北和西南的掌控,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在西北和西南的工业布局,1937年在西南地区以投资、合办形式控制的工厂达到23个,生产电153.3万千瓦时、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锡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形成了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加快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1936年至1937年7月,共修筑铁路2030公里;七七事变前公路里程达到11.5702万公里,初步形成了纵贯全国的交通网。这些措施都为坚持大后方的抗日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抗战头两年仅铁路就输送兵员1100万人次,军需物资300万吨左右。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意识到工业内迁的重要性,沿海工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规模内迁。截至194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迁入内地的工厂达445家,其中兵器工业18家、冶金工业2家、矿业8家、机器制造业181家、电器制造业29家、纺织工业97家、食品工业22家、文化教育用品工业37家,以及其他各业17家。抗战时期,大后方兵器工业能够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重机枪、迫击炮、枪榴榴筒、枪榴榴弹和手榴弹的消耗;能基本满足步枪、轻机枪、炮弹、迫击炮弹的消耗,支撑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内迁的其他工业企业,成为大后方工业体系的骨干。

由于政府收支不平衡、物质供给不足、外援断绝等原因,从1940年开始,大后方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以1939年6月为100计,则1941年12月已高达1029。为应对危机,国民党于1941年3月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决定“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为原则对经济实行全面统制。在所有的统制政策中,以战时的粮食统制最为重要。1941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各省田赋,全部征收实物,供需由中央统筹。田赋征实保证了军队和国家机关人员的粮食供给,节省了国民党政府购买粮食的巨额开支,减少财政支出,减缓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田赋征实折成法币,约占国民党政府各年财政收入的32.66%、49.14%、54.68%。总之,国民党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全面统制,维护了大后方基本的经济秩序和生产,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把抗战进行到底提供了物质保障。

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工业,利用统制政策维护

中国以一个贫而弱的农业国抵御日本这个现代化工业国的进攻,如何维系经济不至崩溃,为抗日战争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苦,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支持抗战,海外华侨以捐款、侨汇、贸易、投资等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战,国际盟友也给予中国抗战巨大的物质支撑,这些都为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敌后战场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减租减息、扩大生产、精兵简政,还将发展公营经济作为缓解财政困难、促进抗战胜利的重要措施。在多种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各根据地的经济均有所发展,为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创立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作战。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地域偏僻,经济落后,中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为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是根据地最主要的产业,在战时情况下,战争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和其他各种物质,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为此,各根据地将发展农业放在中心的位置。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明确指出,农业应该放在第一位。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是中共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减租减息在不损害地主过多利益的前提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它将地主阶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持抗日的积极性,使农村社会各阶层共同汇集在抗日这面旗帜之下。除此之外,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各根据地积极发放农业贷款贷粮,制定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繁殖牲畜、种植棉花、植树造林等有关奖励政策,及时调剂粮棉种子,打制各种农具,派出部队保卫春耕秋收,组织机关人员帮助群众生产,修订抗战勤务条例,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时令和所需人力畜力等。为节约民力,军队在战斗之余也积极参加到农业生产之中。从1941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军队、机关、学校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尽量减轻根据地群众负担,各根据地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不但大大改善了机关、部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密切了中共与根据地群众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

虽然农业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产业,但是,经济的运行须臾也离不开工商业。各抗日根据地将发展公营经济作为缓解财政困难、促进抗战胜利的重要措施。根据地的公营事业主要包括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军队和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抗日根据地也注重保护私人工商业。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采取调节的政策。包括发展中农的生产运动,办好消费合作社扶助中农生产,与富农竞赛,成立商品合作社扶助小手工业生产者,废除苛捐杂税培植小商业者,发展国防工业与资本主义竞争,大胆让资本主义去发展而不压制资本主义,对于劳资关系也采取调节的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提出:“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发表《论抗日根据地的

各种政策》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欢迎他地的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上开办实业,并切实保护他们的营业”。公私兼顾、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措施,促进和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金融贸易政策是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在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活跃根据地市场、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各个根据地输出产品来换取根据地急需物资,维护根据地经济安全和物资充裕,同时能起到保护和支持边区实业、活跃边区市场,增加根据地政府税收等作用。

在多种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各根据地的经济均有所发展,为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44年粮食产量比1937年粮食产量将近多出一倍。其他根据地农业建设的成绩也很大,晋绥根据地军队于1943年开荒20余万亩,相当于群众开荒总数的1/3,收细粮3万余石,养猪1万余只,做到了每人每月食肉3斤。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工业几近空白,经过艰苦的努力后,各根据地创办了纺织厂、造纸厂、制革厂、被服厂、农具厂、制药厂、兵工厂等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以棉纺织业为例,陕甘宁边区1943年拥有纺车120255架,纺纱417852公斤,织布63334大匹。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贸易的繁荣,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00多家,到1943年就发展到400多家。1944年陕甘宁边区对外贸易实现19亿元边币的出超。

1941年起,中共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各抗日根据地不但坚持下来,而且1943年之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人口都有了新的发展。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力量达到91万人,不脱产民兵20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余万,这其中,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根据地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华侨对抗日战争的经济贡献

全世界800万华侨中有400多万人参加了捐款,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31:1。八年全面抗战海外华侨捐款总额达13亿美元国币。不仅如此,抗战时期华侨在国内投资近18亿元,掀起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高潮。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抗战。海外华侨虽远离祖国,但心系抗战,他们以人力物力积极支持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海外华侨在经济上支持抗日战争,主要通过捐款、侨汇、贸易和投资等几种途径。

捐款是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战时华侨捐款从“九·一八”事变时已经开始。捐款的阶层极其广泛,从侨领巨商到生活清贫的工农大众无不参加捐款。当时全世界800万华侨中,有400多万人参加了捐款,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31:1。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八年全

面抗战海外华侨捐款总额达13亿美元国币。华侨的大量捐款,是战时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补充、支持祖国长期抗战的重要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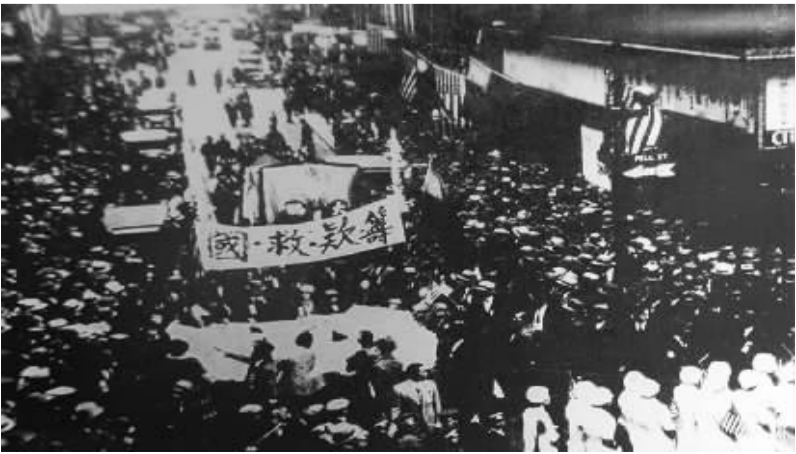
侨汇是指华侨寄给家眷的日常生活费用。由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入超地位,侨汇弥补了入超造成的外汇亏空,被认为是中国无形的输出。从1931年起,侨汇数量逐渐递增,弥补入超的百分比愈来愈大。1937年至1940年,侨汇与入超比例分别是411%、521%、414%、232%。抗战时期的侨汇,一方面垫补了政府大量军费开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约123亿元,当时侨汇即有53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总收入的1/4,相当于军费开支的43%;另一方面,大量的侨汇充作法币准备金,促进法币的流通,巩固了法币在国际上的信用。

积极从事与祖国的商业贸易,是华侨支持祖国经济抗战的重要途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南洋华侨与祖国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七七事变前,我国由南洋各国经常进口贸易为2.6亿元至3亿元,出口为2.6亿元至4亿元;1940年,进口额增加到9.2亿元至11.9亿元,出口增加到10.1亿元至16.6亿元。华侨在我国与南洋的战时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多从南洋进口米、胶、油、药等战争急需或国内紧缺物资。1940年,中国农业严重歉收,南方15省稻谷夏收较往年降低20%,农产品总量减低10%,重庆大米价格指数从5月间213上升到12月间的1004,国民党政府到南洋购买了3万市担米粮,及时补充了我国战时的粮食不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很快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困守大西南,财政经济出现较大困难,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大量侨汇断绝、贸易中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很多华侨直接在国内投资,稳定和繁荣了中国抗战时期的经济。为开发和利用大后方的经济资源,国民党政府先后制定了《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指导归侨垦殖暂行办法》等。海外华侨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在祖国投资,其资本主要集中在工矿业、垦殖业和金融业。据统计,抗战时期华侨在国内投资近18亿元,掀起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高潮。战时的华侨投资是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的又一贡献。如南洋侨领张百基所说,华侨投资可以大量开发资源,可以稳定后方资源,可以抵制敌货流入,可以发展海外国货,可以充实国防利器,可以代替当前捐款之外汇,可以维系华侨爱国之重心,可以拒绝敌伪挑拨之阴谋。

78年前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爆发。中国以一个贫而弱的农业国抵御日本这个现代化工业国的进攻,如何维系经济不至崩溃,为抗日战争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和其他客观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两个战场,然而无论正面战场抑或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都只能通过悉心合理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来克服困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苦,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支持抗战。海外华侨以捐款、侨汇、贸易、投资等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战,国际盟友也给予中国抗战巨大的物质支撑,这些都为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在纽约唐人街上举行筹款救国大会,动员献金支援祖国抗战。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立下了赫赫功——那就是孤悬敌后而威震南粤、蜚声海外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这支英雄的抗日武装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得不到来自党中央的直接支援,在日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夹击之中,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

距东莞市区约15公里的大岭山镇大王岭村,是展示东江纵队历史的一座专题纪念馆,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还有展品丰富的东江纵队主题展览。近200件革命文物、450多幅历史照片、20余件雕塑和油画等艺术作品,翔实地展示了东江纵队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

1938年,日本侵略军强行在大亚湾登陆,随即攻占惠州、广州、虎门炮台等地。从展厅照片中可见,日军所到之处遭受空前浩劫,村庄被焚烧,东莞道滘260多名群众遭毒烟杀害。为抵御日寇的疯狂蹂躏,广东人民在党组织带领下,创建了各种抗日武装。1940年10月,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挺进大岭山区,创建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成为我党在广东敌后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距离大王岭村仅2公里处,就是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的著名一役——百花洞战斗的战场。1941年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在百花洞重创前来“扫荡”的日军,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毙伤日军官兵50多人,事后华南日军头目自称:“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粉碎日伪军的“万人大扫荡”,更是一次荡气回肠的战斗。1943年冬,日军为加强对广九铁路及沿线广州、香港等地的控制,在每个车站驻兵把守,强迫群众抢修铁路,并频频向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一次次的交锋中,我军卡断了日军的铁路运输线,破坏了日军的“全线通车”计划。恼羞成怒的日军出动9000多人,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行“万人大扫荡”。抗日游击队1000多人被敌军围困后,奋力突出重围,并发动群众展开反“扫荡”斗争,迫使日伪军全部撤走。

就在这次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之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正式成立,并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支骁勇善战的抗日武装,以崭新的姿态乘胜前进,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和粤赣湘边区……随着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东江纵队也逐步成长为一支拥有1.1万多人的抗日劲旅。

在展馆内,能见到一张《东江纵队抗日战绩统计表》: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6500余支,缴获炮25门。这张简单的统计表背后隐藏的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今天我们依稀能从馆藏文物中窥见一二。这些文物中,有百花洞战斗中用过的简陋土枪,也有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精致的日本RICOH相机和望远镜;有见证日军罪证的航空炸弹、火焰喷射器、防空防毒面具,也有反映游击队艰苦生活的旧棉裤、打满补丁的急救包;有日本陆军顺德警备队签发的良民证,也有两广纵队的立功奖状和《阵亡将士抚恤通知书》……

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华南军民抗日救亡画卷中,不能不提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被中国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称赞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一次营救行动。

1941年12月,日本占领香港。当时,包括何香凝、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中共中央指示,必须营救他们安全撤离!经过周密策划,一场规模庞大的“虎口营救”行动秘密展开。中共广东、香港的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历尽艰辛,帮助一批批文化民主人士化装成难民,通过了日军沿途设置的层层岗哨,转移到祖国大后方。

这场6个多月的大营救,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在此过程中,无人一受伤,无人被捕,堪称壮举。展馆中有关参与营救者的事迹,读来令人动容。如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秘书长的连贯同志,第一时间前去执行护送任务,却让妻子带上三个孩子跟难民离开香港。一路上,母子四人先是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又被强盗抢劫,苦不堪言。直到在一个小旅馆中偶遇一群连贯奉命护送的人,连贯的妻子情急之下上前表明身份,请求帮助。这群人却感到难以置信:我们从香港一路过来都有工作人员安排,而作为连贯的家属,怎么会沦落到跟难民一起逃难呢?将信将疑地带她见到连贯,才知道果然是家属,大家都感动不已。

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已然过去,东江水静谧地流淌,两岸人民早已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今天,我们重温东江纵队纪念馆里一幅幅尘封的旧照片,抗日英雄们舍家为国的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东江纵队纪念馆

孤悬敌后的南粤旗帜

本报记者 郑杨

本版编辑 敖蓉